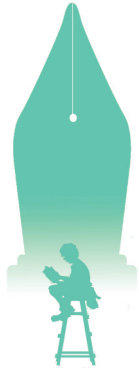


记得当年
高考时

王剑波



1977年10月,我已经在地处三门湾畔的宁海县青珠农场下乡一年半。这是一家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国营农场,场党委提出“棉农不吃商品粮”,我们七名知青和一位老农组成青年队,在围垦不久的“四胜塘”试种水稻。盐碱地板结坚硬,一旦灌水马上变得黏性十足,脚踩下去拔不出来,而且泥浆里满是“咸青”(一种能够淡化土壤盐分的植物)梗,一不小心就会刺伤腿脚。就这样,我们冒着凛冽的海风平土垒堰,踏着刺骨的春水播种育苗,穿着水田袜弯腰插秧,扛着“背包”喷洒农药,身上布满汗水凝结的霜花。劳动虽然辛苦,但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,二十岁的我半是浪漫半是迷惘,在潮涨潮落的大海边谱写着自己的“青春之歌”。因为是国营农场职工,不会再有招工的可能,我也已经作好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打算。

在上海高校任教的父亲一封来信,激起了我心中的波澜。父亲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,要求我抓紧复习功课。上大学是我的理想,但这个梦早已破灭,那时实行“推荐”上学,这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听到恢复高考并且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消息,我上大学的理想瞬间复苏,没有丝毫犹豫,当即决定报考。

我1963年上小学,跟着担任乡村教师的母亲辗转了几个村庄,读的是祠堂里村办学校的复式班(几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),还未读完三年级就遇到了文革。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,在家闲住半年后,到宁海和象山交界的车岙港边,在车岙村“戴帽中学”(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初中班)读初中,第二学期转回老家桑洲中学。

那时的高中同样实行推荐入学。1971年初中毕业后我就投靠亲友去打零工,直至1973年地处天台山脉的千米高山冠峰岗办起“五七”高中,负责招生的岔路区教办负责人是我初中校长,对我的学习成绩有印象,破例招收我上了冠峰中学。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公社林场,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,采茶种树,砍柴挑沙,自己烧窑盖校舍。

由此可见,我接受教育的过程比同龄人更为坎坷,学的知识支离破碎,尤其是理科底子可以用“一穷二白”来形容,所以我决定报考文科。因为相对来说,我的文科基础稍好一些。当时,我千方百计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,哪怕是地上一张有字的纸,都要捡起来看看。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,我每天按时到与学校一路之隔的公社办公室窗外等着,看到邮递员送来报纸,就趁没有上架之前,将桌上的报纸偷偷地拖过来读。后来公社的人也知道了我,见我去了,就主动把报纸拿给我。高中阶段迷恋上写作,我既是校刊的作者、编辑,还负责刻写、油印、分发,一个人办起了一张报纸。后来做起了“文学梦”,在农场繁重的劳作之余坚持写作,在《宁海文艺》发表诗歌,并参加过县里的文艺创作座谈会。这也为我报考文科增添了信心。

一时间,高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,尤其是年轻人群情激奋、跃跃欲试。各学校都把毕业生召回去复习。由于长街区(农场所在地属于长街区)报考人数太多,长街红旗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,准备选取基础较好的集中起来复习,我也参加了这次考试。记得一天晚上场里放露天电影,放映员宣读去长街集中复习的名单,但因为我不是红旗学校的毕业生,没有听到我的名字,心里一阵失落。

接到红旗学校复习通知的可以名正言顺地请假,一些县城来的知青也回去了。母亲来信要我回家去岔路中学复习,但当时正是晚稻收割季节,我不好意思请假,只得白天照旧下地劳动,晚上一个人在灯下复习到深夜。

说是复习,其实也没有资料,母亲寄来我用过的高中课本,我就从头至尾把数学习题做一遍,因为没人辅导也没人讨论,效果可想而知。语文基本没有复习也没法复习,有空时就翻翻《新华字典》。就这样,一直到11月20日参加宁波地区的初试,心里也没个底。

地区初试在红旗学校进行,就考语文、数学两门。其他的题目已经记不住了,只记得作文是《十月》和《怀念》二选一。我写的是《怀念》。我从棉花地里听到广播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,

禁不住眼泪打湿棉花叶写起,回顾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,抒发了怀念伟人的心情和继承遗志的豪情,写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套话。一则简单的古文翻译,把“吾”翻成了“你”。数学差不多交了白卷。自己对这次考试非常不满意,心情有点沮丧,觉得没有希望参加省里统考了,所以回来后也没继续复习,心想等明年再考吧。

12月2日清晨,我在睡梦中被室友叫醒,广播里正在播送地区初试合格名单,农场有14名考生可以参加省里统考,里面有我的名字。这时我睡意全无,十分兴奋,至少有参加省里统考的机会了。

第二天开始,长街区的考生全部集中到红旗学校上课,分文理科组织复习。我每天搭乘好友陈金火的自行车,一早从农场出发,路上需要一个小时,傍晚下课后再赶回农场。

上语文课的是黄金法老师。一次他布置作文,题目是《为了明天》;之后他找到我,问我地区考试时写的是哪个题目。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,黄老师看了我的作文,认为以我的文笔,对付高考作文应该没有问题。全省统考科目文科是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史地。听黄老师这样说,我对语文心里有了底;因为我一直比较关心时事,觉得政治也不是大问题;数学是我的弱项,想要在短时间得到很大提高也难;历史与地理记忆的成分多一些,而前阶段基本没有复习,应该作为重点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白天在课堂上上课,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复习史地。历史好歹有一本教科书,而地理在中学时根本没有开课,手头仅有的一本《知识青年地图册》就成了我的复习资料。

12月15日,我终于走进了改变命运的高考场。考试前夜,我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:“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复习,明天,我们就要向党汇报、接受祖国的挑选了!”连续两天的考试,一些细节已经模糊,但那种兴奋甚至是神圣的感觉至今还难以忘怀。

40多年后,我在网上再次看到了当年的语文试卷,就像故友重逢,分外激动,但也惊呼:“如此简单!”就是这简单浅显的题目,难住了当年的我们。走出考场,大家议论纷纷,相互询问:“高屋建瓴”的“建”到底什么意思?毛主席诗词中的带点的字答对了吗?对古文“齐人攫金”的寓意更是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

记忆最深的是作文题《路》。当时普遍流行社论体和大批判文章,把《路》作为题目令人意外,但对我这个“文学青年”来说,却是正中下怀,看到题目一阵惊喜,稍一思索就提笔写成了一篇抒情散文。作文的开头是:我求学的高中办在千米高山,每次返校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攀登……接着写途中的艰辛和到达顶峰的喜悦,然后就从现实的路联想到中国革命之路,最后不忘点题:为了明天,继续攀登。虽然稍显牵强,但也符合当时通行的逻辑和写法。

记得地理试卷有两道读图题,事后才知道,一道是美国地图,要求填出“墨西哥湾”和“落基山脉”;一道是“长三角”地图,要求填出“杭州湾”以及几个城市。“长三角”地图我看懂了,但美国地图没看出来,结果“死海”“黑海”乱写一气。两天考试结束后,我觉得基本得到发挥,会答的都答了。

考试结束后我回农场继续劳动,直到1月9日参加体检。据说是按招生名额1:2.5的比例确定体检人数,宁海街头张贴了全县所有上线考生的名单。体检过程稍有波折。当时我正好生病,拔掉挂针和同伴一起乘车去力洋区卫生院,途中冷风一吹,当晚就发高烧,结果体检时心跳过快,后来证实是发烧引起,总算有惊无险。

忘记是考试前还是考试后填的志愿,只记得《浙江日报》用一个版面刊登了招生学校和专业,我报的三个志愿先后是:杭州大学中文系、浙江师院中文系、杭州大学历史系。

春节后,农场一起参加高考的已经有人接到录取通知,但我的通知并没有如期到来,于是着手制订复习计划,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。我利用休假时间去岔路中学葛才丁老师处讨要复习资料,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,毕业于文革前的南京大学。葛老师也许是为了安慰我,就说:你的成绩应该没有问题,可能还是“政审”的原因。随我一起去的亲戚又从另一个角度安慰我:“政审”应该不会有事,还是分数不够吧。

3月17日,我接到通知去红旗学校重新填报志愿,才知道要扩大招生。那一年的考试成绩并不通知考生本人,红旗学校的老师告诉我,留下的考生里我的分数是最高的了。扩大招生的学校大多有走读要求,我就填报了能够住宿的浙江师院金华分校。

4月8日傍晚,去红旗学校复习的陈金火替我领回了录取通知,我在农场的桥头等他,远远地就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扬着信封在喊:“台州中文系、台州中文系!”这个镜头伴随着春日的晚霞,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1978年5月,我告别了生活、劳动整整两年的青珠农场,踏进了浙江师范学院台州分校的大门,开始了我人生的新征程。